



经世悲欢： 崇厚传

*The Laughter and Tears in Benefiting the Society:
The Life of Chonghou, 1826-1893*

汤仁泽 著
Tang Renz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经世悲欢： 崇厚传

*The Laughter and Tears in Benefiting the Society:
The Life of Chonghou, 1826-1893*

汤仁泽 著

Tang Renz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世悲欢:崇厚传(1826-1893)/汤仁泽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ISBN 978-7-80745-582-0

I. 经… II. 汤… III. 崇厚(1826-1893)—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146 号

经世悲欢:崇厚传(1826-1893)

著 者:汤仁泽

责任编辑:余 珂

封面设计:皮 鲁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4.75

插 页:6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582-0/K·088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熊月之

崇厚是晚清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在同光年间相当活跃,官至署直隶总督、盛京将军,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中国与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约章签订,创设天津机器制造局,购买并制造军火,参与著名的天津教案的处理,参与中俄伊犁交涉,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其地位之崇,历事之多,影响之广,为满人官员中之翘楚。

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崇厚的研究成果却相当稀少,与其地位很不相称。考其原因,主要是他所历诸事,在近代学术评价体系中,多属负面,包括办理天津教案,交涉伊犁利权,特别是其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在当时与后世,均为人所诟病。彰善挞恶为中国史学一大传统,对于这样一个贬多于褒、基本上属于反面的人物,肯下功夫进行研究的人自然稀少。

然而,纸上的历史与事实的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纸上的历史也终究要以事实的历史为依据。出于清理历史事实的需要,不但要研究那些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正面人物,也要研究那些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反面或灰色人物;不但要研究那些血染疆场的抗敌英雄,也要研究在谈判桌上与列强周旋的外交人士;甚至对那些误国之人、卖国之徒也要进行研究与剖析,找出其错误之处、失足之点,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在这个意义上,秦桧、汪精卫都有研究的价值。当然,评价体系自身也会变化,数十年间,孔子、秦始皇、洪秀全之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就是显例。

放宽视野，放长眼光，一切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重要人物都值得研究。本书研究的崇厚，在近代学术评价体系中，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就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进行深入研究，更有必要。

崇厚出身名门，家族中五代进士，显赫一时，父麟庆、兄崇实均为进士出身，均官至总督。崇厚祖母、母亲均为汉人，知书达理，崇厚自幼所受教育，均为儒家诗云子曰一套，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衙门里。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为崇厚进入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崇厚这样的家世学养，假如生在承平时代，读书做官，平静地度过一生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却遇上了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他十五岁那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不断袭来，空前的内忧外患，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摆在一切有着修齐治平理想的士人面前。崇厚受命于动乱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

仁泽兄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的哲嗣，子承父业，大学本科即为历史系，后负笈日本，研修历史学多年，回国后专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本书是他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他广泛而细致地查阅了有关崇厚的资料，查阅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使用了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崇实的《惕庵年谱》、崇厚的《鹤槎年谱》等重要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写成这部完整、系统而翔实的崇厚传记。书凡十四章，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除了研究崇厚亲历的众多重要事务，诸如担任三口通商大臣、办理天津机器制造局、办理

天津教案、出使法国、治理盛京、出使俄国等,还对其父、兄等家族成员的历史,对其日常生活细加研究,内容相当丰满。这是一部填补晚清人物研究中重要空白的力作,对于人们丰富、加深了解晚清诸多人物事件均有重要价值。我与仁泽兄同事多年,得以先睹为快,特此郑重推荐。

2009年5月1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序 言 / 熊月之	1
绪 论	1
第一章 名门之后	11
第一节 厚实养心,诗书传家	11
第二节 金源世系,珂里名门	15
第三节 科名起家,仕途顺畅	22
第四节 “再至堂”读书识字	25
第五节 深知大体,移孝作忠	29
第六节 “清晏园”兄弟受业	32
第二章 家事多变	39
第一节 母亲病故,父亲免职	39
第二节 兄弟名起,须知父志	45
第三节 祈求康复,回天乏术	49
第四节 整理图记,兄弟分途	51
第三章 初涉“夷务”	55
第一节 捐资鬻官,襄理海防	55
第二节 英法进犯,协防津门	62
第三节 奕訢举荐,扶植亲信	64
第四章 独当大任	70
第一节 筹办夷务,首任“通商”	70

第二节 上任伊始,拟定《章程》	72
第三节 普国订约,初开眼界	76
第四节 坐镇天津,恪守圣旨	80
第五章 洋务先锋	86
第一节 不识洋人用意,急购外洋火器	86
第二节 师夷长技,以图自强	90
第三节 加强海防,拱卫京畿	93
第四节 津门练兵,假洋资用	97
第五节 评议《局外旁观论》	101
第六章 天津机器制造局	107
第一节 南方先行,北方急赶	107
第二节 聘用外员,征地购件	112
第三节 外师指教,上海协办	115
第四节 奉命使法,移交直督	120
第七章 天津教案	125
第一节 洋教传入,禁而不止	125
第二节 积怨生愤,教案突发	125
第三节 自请治罪,降级留用	131
第四节 临危受命,带病赴津	137
第五节 曾、崇联手,坚保和局	145
第六节 案无头绪,迫如星火	150
第七节 保和媚洋,曾遭怨恨	153
第八节 拿犯赔款,鸿章结案	157
第九节 裁撤“通商”,委以重任	164
第八章 出使法国	167
第一节 亲赍国书,代达衷曲	167
第二节 离京赴法,任重道远	173

第三节	倍受轻慢,潇洒“出走”	176
第四节	风光返法,递书修好	179
第五节	成功外交,教案终结	183
第六节	衣锦回京,加恩受宠	187
第九章	治理盛京	191
第一节	载荣载誉,兄弟重逢	191
第二节	两宫重托,再返内政	193
第三节	兄终弟继,整饬吏治	198
第四节	革新除弊,力挽颓风	202
第五节	调兵遣将,维持治安	205
第十章	收复伊犁	210
第一节	西北屏障,古今重地	210
第二节	趁火打劫,贪心未餍	215
第三节	侵占伊犁,交涉无果	222
第四节	收复失地,再索伊犁	226
第十一章	出使俄国	232
第一节	特权大使,权重隐患	232
第二节	海道赴俄,通好修约	236
第三节	得意忘形,深陷迷惑	240
第四节	善结他国之欢,重损国家利益	245
第五节	贪得无厌的“分界说”	250
第六节	《里瓦几亚条约》	255
第十二章	处罚风波	264
第一节	朝野骇然,众谤沸腾	264
第二节	革职拿问,治罪受阻	277
第三节	暂免斩罪,平洋疑愤	287
第十三章	改约艰难	305

第一节 纪泽赴俄，肩负重望	305
第二节 为促改约，加恩开释	312
第三节 故伎重演，虎口夺食	315
第十四章 宦海余生	328
第一节 俄事暂平，清议再起	328
第二节 安居乐室，儿孙满堂	332
第三节 韬光养晦，复出无望	334
附录一：崇厚生平大事年表	340
附录二：清廷对若干中俄条约的签注	354
附录三：《中俄改订条约》	373
参考文献	380
后记	385

绪 论

崇厚是晚清经办外交、洋务的重要人物之一，首任三口通商大臣，代表总理事务衙门与各国交往，因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而身败名裂，受到谴责。崇厚以一名不起眼的举人一跃而为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盛京将军，之后又被派赴沙俄交涉伊犁问题，回国后锒铛入狱，定“斩监候”，成为备受诟病的“反面”人物。他的一生大荣大辱，大起大落，就其经历的传奇性，似乎不能没有专门传记。

《清史稿》虽有崇厚的传，只是寥寥数百言；《清代碑传集》正、续、三编也只有其兄崇实的传而没有崇厚。至于晚近论著，也未见崇厚专传，连专门论述崇厚的文章也难得一见。但是，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的，历史工作者的职责是忠实地记述和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果评论历史人物只停留在口诛笔伐式的宣泄上，就容易掩盖乃至曲解历史真相。崇厚身居要津，任事年久，除了《里瓦几亚条约》外，在经办军工制造、训练军队、巩固海防、整饬盛京事务等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对历史和社会也不是没有影响。对这样一个历时既久、影响亦大的满族要员，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述评，实在有其必要。

一

崇厚(1826 - 1893)，满族镶黄旗人，完颜氏，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出身名门，累世贵显，父祖辈不乏“名臣硕辅”、位高权重者；其家族也有过“我朝大儒”、“五代进士”的辉煌。崇厚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汉人。祖母

恽珠是清代知名的女文学家，被后人称为才女和良妻贤母。她为孙儿们分别取名“实”、“厚”，期盼他们成为踏实、忠厚之人。母亲程孟梅“事亲以孝，教子有方”。儒家文化的熏陶，深深地影响了崇厚。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崇厚中举人，次年授甘肃阶州直隶州知州，再任直隶通永道、永定河道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在胜保军营任翼长，攻打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八年（1858年）为防御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海防，又迁长芦盐运使。八里桥战役失败后，崇厚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抚局”。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崇厚首任三口通商大臣，直至1870年6月28日天津教案发生，奉旨充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为止，任职近十年。崇厚先后参与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约章签订。天津教案发生，中法关系紧张，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1878年（光绪四年）派赴沙俄交涉伊犁问题。次年，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回国后被捕入狱，定“斩监候”。朝廷拒绝批准条约，派遣曾纪泽赴俄改约。七月，加恩出狱，罢免居家。1884年（光绪十年）八月，捐银三十万两助军。十月，慈禧太后五十寿辰，特赏给二品衔。

二

崇厚涉足外交领域的时候，正处中国近代外交的发轫期，是“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①，他既是第一位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又是首位出使俄国的全权大臣，与法、俄等国高官接触最多。

郭嵩焘说崇厚“贻误国家”，分析他致误原因：“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一在力持敷衍之计

^① 梁启超：《李鸿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0页。

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①说崇厚是不计国家利益、不识世界大势之人。

萧一山将崇厚与曾纪泽作了鲜明对比,赞赏曾纪泽“以其智识任其艰巨,宜能挽回危机,力破成局”,“若与崇厚之‘名知洋务,但言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只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者相较,诚有天壤之别矣”。所以他认为“崇厚之洋务,犹传耆善、耆英、奕经、奕山之衣钵”^②。换言之,崇厚是不知洋务的卖国外交家。

范文澜认为崇厚是个无能的外交家:“崇厚是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当事人之一,曾到过法国谢罪,这在满人中算是外交家了,清政府特给‘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头衔,希望他人去地回,折汉人尤其是李鸿章的锐气。不料崇厚到俄京,索得伊犁一个城池,却签订割让大块土地、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新疆到汉口陆路通商、松花江航权等十八条款,丧失巨大权利。”^③

胡绳说崇厚是“颞顚糊涂”的外交家:“崇厚甚至连伊犁地区的形势也全不了解,一切听凭俄国人要怎样就怎样。”^④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马士说:“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⑤

总而言之,都说崇厚是个失败的外交家。但仔细查考后发现,崇厚使法并非“失败”,他还是大清的“功臣”。崇厚抵法后,法方故意刁难和逼迫,递交国书不成,反遭“冷处理”,如再“顺从”、“将就”下去,对教案的善

① 《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奏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救之方折》,王弢夫、王希隐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第18-19叶。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06页。

③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4-235页。

④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⑤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65页。

后会更加不利，只有给对方施加压力，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崇厚毅然“出走”，先至英伦，再赴美利坚。此举颇出法方预料，法方果真改变态度，追至美国，“略显诚意”，“再三强请”返法。崇厚“坚持定见”，“刚柔相济”，“设法转圜”，冲破重重阻拦，做得“有理”、“有利”，还顾全大清和自己的颜面，完成了赴法修好的重任，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终于结案。此次“成功”，让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刮目相看，所以赴俄谈判时，崇厚成为首选钦差大臣。

三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逐步走上衰败的道路，外国列强乘清廷之危，扩大侵略。马克思说：“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①

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涌现出一批先进的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的思想，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内忧外患日亟，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只有挣脱侵略者的锁链，走上自强富国之路，别无选择。此后，一批将“师夷”主张付诸实践的疆臣和官员，发起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走向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崇厚生逢其时，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借法自强”，试图借用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帮助日渐式微的清王朝重新强盛起来。魏源要以“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具体办法是：“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之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缺冗者裁并之，一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①。

崇厚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事务，亲身参与“添筑炮台，安设木筏”，亲眼目睹英法联军的坚船“势极猖獗”，深感“夷人炸炮、火箭猛烈”，体会到“从事军营所见，中国器械，实系远不如外洋迅利。非特洋炮炸弹并以制胜，即鸟枪亦较中国远而且准，且上有长矛，亦可借以交仗。其火药铅弹，工料俱精”。他向总理衙门建言：“如果不惜重费，设法购买，加以挑选将弁，训练兵丁，必可得力。”^②这是崇厚就当时实际情况提出的合理的建议。

办洋务是奕訢等人的“长久之策”，崇厚作为奕訢的亲信和干将，遵照“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③的指导思想，赞成办洋务，可见他对形势是有所认识的。

崇厚积极购买轮船和各种军用器械，以加强津京的防卫力量。同时，还兼办海防，首次对京兵和天津镇标兵进行大规模的西式训练。而最重要、最有实效的是创办生产军火的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5月正式开局，在天津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设立火药局，是为东局，又在天津城南海光寺兴建西局。该年度海关《关册》称：“中国人既已认识在这种事业方面可以使用外国机器与技术，那么在开发中国富源方面的种种障碍也许就有希望能够逐渐减少了。”^④第二年，制造出洋劈山炮四百八十尊，炮车二百四十辆，对子开花炮一百二十尊，炮车六十辆，并随带铁子、铅箭、炸子、火药等军火。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发生，恭亲王奕訢听各国使臣说，法国可能因此用兵，对各国商情有碍，中国必须拿出妥善办法。朝廷命崇厚充

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6页。

② 《总署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第18页。

③ 《总署奏》，《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7页。

④ 《关册》（天津，1867年分），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8页。

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赴法赔罪，天津制造局交李鸿章主持。

创办天津机器制造局为了“渐图自强”、“防患固本”，既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目的，又有抵御外侮、“尽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长，操纵有资，外侮莫由肆其焰”的意图。崇厚经营四年，初具规模。天津制造局是中国近代史上在北方创设较早的洋务厂矿之一，也是“数千年一大变局”中发挥一定作用的近代企业。崇厚办洋务，与各国交往，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京津地区的“洋务”晚于上海、广州，崇厚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投入到购买新式船炮和仿造制作的“洋务”之中，经崇厚谋划经营，渐有起色。可以说，他在天津教案前的兴办洋务，是有成效的。

我们不能否认办洋务之初是为了“剿发”、“剿捻”，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也不能否认办洋务者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动机和作用。洋务派开创和兴办了近代军用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训练了科学技术人员，改变了陈旧落后观念，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崇厚是较早的探索者，在中国历史的变革关头起过先导作用。

崇厚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其兄盛京将军刑部尚书崇实病逝，崇厚奉旨署理盛京将军，“兄终弟继，诚异数也”。盛京（沈阳）是清王朝的“根本重地”，而“现在该处吏治败坏，营务废弛，以至马贼充斥”。崇厚赴任后，请调直军精锐之师和精干属员来盛京，以确保治理成功。他亲赴东部边境与朝鲜交界地查勘，奏请严立禁令，以杜彼此人民私越。光绪三年二月奏请升昌图厅为府治；奏请增设东边各县：于六甸之宽甸添设宽甸县；六道河添设怀仁县；头道江添设通化县，且分疆画界，委员分署，以加强地方行政管理。

崇厚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为的是清除东北部边境地区历年来的积弊：如人员混杂，“自易潜越”；如随意垦荒，疏于管理，经清查地亩，“业有成数”；又如添设州县，委员试办，将丈量后新增田亩入册，将开垦者编入户口册籍，便于管理，又可征收钱粮，“统俟一律丈完升科之后，每年约可征收正款三万数千余两”。崇厚还在东三省创办盐课，增加税收。

另一举措是处置劣官,纠正风气。崇厚在盛京改革创新,清除积弊,政绩显著,对加强盛京地区的边防、保一方平安起了作用。

四

崇厚自幼接受过较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从他的知识结构方面而言,显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占据绝对优势。李提摩太对李鸿章说:“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①。这样的知识结构,与当时绝大多数文人或官僚并无两样。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孔子“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思想根深蒂固,儒家向往的理想世界是“大同”。何休把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衰乱”、“升平”和“太平”的“三世说”,“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由最初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进而“内诸夏而外夷狄”,最后迎来太平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②到了“太平世”,远方之人顺服归化,华夏与夷狄区别消除,天下归于一统,共同进入“大同”。

到了近代,办“夷务”的官员们仍然套用儒家学说。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郭嵩焘说:“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恃其强以求一逞。”^③崇厚说:“溯查自古外患与内患频来,史册所载,代有其事。惟在修德树威,示之以信。经国之道,曰柔

①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4 页。

② 陈立:《公羊义疏》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79 页。

③ 郭嵩焘:《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40 页。